

THE WAY TO HAPPINESS

幸福的钥匙



[俄罗斯] 米哈伊尔·左琴科 著

戴 骢 译



上海三联书店

THE WAY TO HAPPINESS

幸福的钥匙



[俄罗斯]米哈伊尔·左琴科 著
戴 骢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幸福的钥匙/〔俄罗斯〕左琴科著;戴骢译.-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9.1
ISBN 978-7-5426-2938-8

I.幸... II.①左...②戴... III.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71316号

幸福的钥匙

著 者/〔俄罗斯〕左琴科

译 者/戴 骢

责任编辑/戴 俊 叶 庆

装帧设计/**metis** 灵动视线

监 制/研 发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396弄10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9年1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280千字

印 张/21.25

ISBN 978-7-5426-2938-8/I·409

定 价: 32.00元

序

我早就想写这本书了。我的《重返的青春》刚一问世，即已萌生此念。

我以将近十年的时间为这部新作收集素材，一直在期待战事平息，天下太平，以便能在我书斋宁静的氛围中坐下来写作。

可是这样的氛围没有出现。

相反，德军的炸弹两度在我这些素材附近爆炸。石灰和砖块纷纷落到放着我手稿的公文包上。火焰都要烧着我这些手稿了。我至今惊讶不已，这些手稿怎么会保存下来的。

我所收集的素材随我一齐乘坐飞机，由被围的列宁格勒出发，飞越德军的火线。

我携带了二十册沉甸甸的记事本。为了减轻它们的重量，我撕掉了布皮封面。可它们仍有八公斤重，而飞机允许携带的行李只有十二公斤。事后我曾后悔不迭，怎么不带几条绒布衬裤和一双供替换用的靴子，却带了这么一大摞废物。

然而，对文学的爱终于占了上风。我安于我不幸的命运。

我把我的手稿装在一只破烂的黑公文包里带到了中亚，带到了如今成为我洞天福地的阿拉木图。

有整整一年时间，我在这座城市里创作伟大卫国战争的岁月所需要的各种各样剧本。

我把带来的素材放在木制的沙发床里边，晚上我就睡在这张床上。

偶尔我掀开我的沙发床的木棚。在胶合板的底板上，我那二十本记事本同一袋面包干静静地躺在一起。面包干是我按列宁格勒的习惯未雨绸缪地烘制好的。

我翻阅着这些记事本，一种苦涩的遗憾心情油然而生，因为着手写这部作品的时候还没到来。看来，现在不需要这种东西，它离战争太远了，离大炮的轰鸣、炮弹的啸声太远了。

“没关系，”我安慰自己说，“一旦战争结束，我马上动手写这部作品。”

我把那些记事本放回沙发床的底板上。随后躺到沙发床上，在心里估计战争什么时候能够结束。我估计的结果是不可能很快就结束。那么究竟何年何月呢，这正是我所无法确定的。

“可是凭什么说写这部作品的时候还没到来呢？”有一回我这么想，“要知道我的素材是讲人的理性的胜利，是讲科学，讲意识的进步。我的作品是驳斥法西斯主义的‘哲学’的，后者认为意识给人带来无穷的灾难，人的幸福在于回到野蛮期，回到原始，在于摒弃文明。”

由此可见，正是此刻阅读这部作品较之今后有更大的意义。

1942年8月，我把我的手稿放到桌上，不等战争结束便动笔写作了。

目 录

- 1/ 楔 子
- 6/ 我真是不幸，却又不知道原因何在
- 19/ 落叶萧萧
- 101/ 可怕的世界
- 148/ 日出之前
- 170/ 黑水滔滔
- 185/ 把门关上
- 208/ 老虎来了
- 226/ 危险的联系
- 251/ “理性是祸患”
- 279/ 理性战胜死亡
- 294/ 理性战胜痛苦
- 306/ 理性战胜衰老
- 313/ 尾 声
- 318/ 跋
- 320/ 文学作品的生命力(译后杂谈)

楔子

只要是抱着良好的愿望演奏，
演员的演技可以不予苛求。

十年前，我写就一部中篇小说，题目叫《重返的青春》。

这是一部常规的中篇小说，大多数作家都是这么写中篇小说的，然而我在小说中加进了不少诠释——都属生理学性质的探讨。

这类探讨旨在解释小说主人公们的行为，向读者提供有关人的生理和心理方面的若干信息。

我写《重返的青春》并非供科学界人士阅读的，然而恰恰是他们对拙著特别感兴趣，召开了许多讨论会，进行了争论。我听到了好多挖苦的话，但也有说好话的。

使我大为窘迫的是科学家们竟那么认真，那么热烈地同我争论。这并非说明我知识渊博(我是这么想的)，而是说明科学界没有充分触及我由于涉世不深而敢于触及的那些问题。

科学家们，不论是挖苦我的还是说好话的，跟我交谈时，都几乎把我视做与他们平起平坐的同行。我甚至多次接到“脑科研究所”要我出席会议的通知书。伊凡·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还邀请我去参加“巴甫洛夫星期三”。

然而我要再说一遍，我写的并非科学著作。这是一部文学作品。科学素材仅仅是一个组成部分。

我一直感到奇怪的是，画家在画人体之前，必须先学解剖学。只有掌握了解剖学的知识，画家才能在作画时避免出错。而作家要描绘的远不止人体，还要描绘人的心理，人的意识，却很少去追求这些方面的知识。我认为我有义务要学点儿东西，并把学习心得与读者分享。

于是产生了《重返的青春》。

现在事隔十年之后，我清楚地看到我这本书失之片面，有不少地方不能自圆其说。看来过去为此对我的责骂还不够厉害，应当骂得更凶些。

1934年秋天，我认识了一位大名鼎鼎的生理学家。

在谈到我这部作品时，这位生理学家说：

“我宁愿读您写的普通的短篇小说。不过我也承认您写的东西是应当写的。研究人的意识不仅仅是科学家的事。我认为就现阶段而言，恐怕更大程度上是作家的事，而不是科学家的，我是生理学家，因此我不怕说出这一点。”

我回答他说：

“我也是这么想的。意识的领域，高级心理活动的领域，更大程度上属于我们，而不是你们。人的行为可以而且应当借助于狗和柳叶刀的帮助加以研究。然而人(狗也一样)，有时会出现‘幻觉’，而幻觉即使在同一刺激物的作用下，也会以异常的方式改变感觉力度。正因为如此，有时就有必要‘同狗交谈’^①，以便摸清其错综复杂的幻觉。而要‘同狗交谈’就非我们莫属了。”

科学家微微一笑，说道：

“您的话有正确的部分。刺激强度和反应的对比往往因人而异，更何

① 意指分析狗的条件反射。

况在感觉范畴内。如果您染指这个领域，那么恰恰在这里同我们相遇。”

这次谈话后几年，这位生理学家获悉我在写一本新书，便请我把书的梗概讲给他听。

我回答说：

“简单地讲，这本书写的是我怎样摆脱不必要的忧伤，从而成为幸福的人。”

“这是论文还是小说？”

“是一部文学作品。科学之纳入这部作品就像历史有时纳入小说一样。”

“又将插入大量的诠释吗？”

“不。这将是某种结构完整的东西，一如大炮和炮弹可以成为完整的统一体。”

“那么这部小说将写您自己啰？”

“有半本书将写我自己。不瞒您说，这使我非常难为情。”

“您将要讲您的私生活吗？”

“不，还要坏。我将要讲的那些东西是不怎么适宜写进小说的。我聊以解嘲的是那是我年轻时代的总结。这就跟讲死人的事差不多。”

“您将写到什么年纪？”

“三十岁左右。”

“也许再加十五年会更好吧！您的书将更完整，谈了您的一生。”

“不，”我说，“自三十岁起我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已不适宜作为我作品中的描绘客体。”

“难道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这甚至不是用变化二字可以形容的。出现了一种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生活。”

“怎么会呢？这是精神分析学吗？弗洛伊德？”

“完全不是。这是巴甫洛夫。我运用了他的原理。这是他的思想。”

“那么您本人做了些什么呢？”

“我做的事实际上非常简单：我排除了妨害我的东西——我意识中错误地产生的不正确的条件反射。我消灭了这类条件反射之间的错误的联系。我斩断了巴甫洛夫所说的‘暂时性联系’。”

“用什么方法？”

当时我尚未充分思考我的素材，因此难以回答这个问题。但我还是讲了我的原则。当然是极其含混的。

科学家沉吟有顷，回答说：

“写吧。只是千万别诱使人相信任何东西。”

我回答说：

“我会谨慎行事。我只让人相信我已证实的东西。而且只让个性与我相近的人相信。”

科学家哈哈大笑，说道：

“这样的人不会太多。不多才是正常的。譬如说吧，托尔斯泰的哲学只对他本人有用，对其他人都是无用的。”

我回答说：

“托尔斯泰的哲学是宗教而不是科学。是一种有助于他的信仰。我同宗教南辕北辙。我谈的既非信仰也非哲学体系。我谈的是由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所验证的颠扑不破的公式。我在这件事上所起的作用是渺小的：我根据人的生活实践检验了这些公式，把我认为没有联系起来的东西加以联系。”

我同这位科学家分手后，从此再没见到过他。大概他以为我由于力不胜任，一定搁笔不写了。

其实，我已在上文奉告各位，我在等待战事平息，太平年代到来。

然而战事迟迟没有平息。这是非常遗憾的。在隆隆的炮火声下，我写得很不顺手。作品的美感无疑大为降低。心灵的激荡摇晃着作品的风

格。焦虑使知识趋于贫乏。明明心神不宁，却误认为不过是下笔匆忙。而这一切势必授人以柄，被视为草率地对待科学，视为对科学界的大不敬……

科学家！

若你看到我哪句话有伤大雅，

我允许你用如椽巨笔勾掉它。

但愿有教养的读者原谅我的粗鄙和谩陋。

我真是不幸， 却又不知道原因何在

啊，真是可悲！躲开灿烂的阳光，
到监狱里去寻找欢乐的地方，
凭着一盏孤灯的光亮……

我一回想起我的青年时代，就感到惊讶，我那时怎么会那么忧伤，那么多愁善感。

最美妙的青年时代竟涂上了黑漆。

我在童年时从来没有这样郁郁不乐过。

可是刚一步入青年时代，一种无与伦比的莫名的愁思就如阴云一般笼罩着我。

我想生活会给予我欢乐的，便竭力去接近人们，寻找朋友、爱情、欢会……然而我并没有在其中找到丝毫慰藉。

一切到了我手里就黯然失色。忧郁寸步不离地跟踪着我。

我真是不幸，却又不知道原因何在。

可我当时只有十八岁，自以为找到了解释。

“世界是可怕的，”我那时这么想，“人是鄙俗的。他们的言行举止滑稽可笑。我可不是这种羊群里的羊。”

在我的书桌上方贴着索福克勒斯^①的四句诗：

① 索福克勒斯(约公元前496—前406)，古希腊诗人、剧作家。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

崇高的天赋绝不会栖于凡躯，
倘若你见到日光照亮寰宇，
啊，赶快登上归途，
回返太虚那亲切的故居。

当然我知道还有不少人持另外一种观点。对生活抱着乐观的，甚至是欣喜若狂的态度。然而我瞧不起那些在生活的鄙俗、刺耳的音乐下兴致勃勃跳舞的人。这种人在我看来还处于野人和动物的水平。

凡是我在周围见到的一切，无不坚定了我的这种观点。

诗人写缠绵悱恻的诗，为自己的伤感而自豪。

“伤感袭上了我心头——它是我的圣母，是我白发苍苍的主母。”我反复吟咏这两句诗，只是记不起作者是谁。

我所倾慕的哲学家们对忧郁症的评价是敬重的。康德写道：“忧郁症患者具有崇高的感情。”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忧郁的气质有助于深刻思考，并伴随着才华。”

把劈柴添进我暗淡的篝火中的不仅仅是诗人和哲学家。说来也怪，在我那个年代，忧伤被认为是善于思考的人的特征。在我那个圈子里，大凡沉思的、忧郁的甚至厌世的人都备受尊敬。^①

简言之，我那时认为对生活持悲观态度乃是善于思索、感情细腻、出身贵族的人应当持有的唯一态度。而我正是贵族出身。

因此我认为我患有忧郁症是正常的，我的忧伤和某种程度的厌世正是我智能的特征。而且看来不只是我一人智能的特征。看来，是一切力

^① 不久前我翻阅瓦·勃留索夫的《日记》，看到了这么一句话：“雅罗申科气质高尚。是个可爱的人，与生活格格不入……”——原注

求使自己的意识高于动物的意识的人的特征，是一切这种人的智能的特征。

如果的确是这样的话，那就非常悲哀了。然而看来的确是这样。在自然界中，优胜的总是粗糙的生物组织。粗鄙的感情，肤浅的思想总是无往不利。一切纤巧的东西都以毁灭告终。

我十八岁时就是这么想的。不瞒你们说，在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仍是这么想的。

然而这样想是错误的。现在我怀着幸福感向各位宣告，我这样想是犯了可怕的错误。

这个错误当初险些送掉我的性命。

那时我想死，因为我看不到其他出路。

1914年秋天，爆发了世界大战，我离开大学，参加了军队，准备以死报国，这样死就不是轻于鸿毛了。

不料在战争中我反而不再忧伤了。即使忧伤偶尔袭来，很快也就过去了。在枪林弹雨之下，我平生第一次觉得自己几乎是幸福的。

我反复思考：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我当时得出的结论是我在战场上找到了生死与共的袍泽，所以我不再忧思重重。这是合乎逻辑的。

我在高加索近卫师米格列尔团服役。我们相处得非常友好。官兵亲如手足。也许这只是我当时这么觉得。

我十九岁时已擢升为中尉。

二十岁时已有五枚勋章，晋升为大尉。

然而这并不说明我是个英雄，而是说明我整整两年没有离开过火线。

我参加了许多战斗，挂了花，受毒气伤害，心脏出了毛病。然而我的情绪几乎始终是愉快的。

革命刚一爆发，我就回到了彼得格勒。

我没有丝毫恋旧的伤逝之感。相反，我希望看到一个崭新的俄罗

斯，跟我所熟悉的苦难重重的俄罗斯截然不同。我希望周围的人都是健康的，朝气蓬勃的。而不要像我那样动辄忧从中来，郁郁不乐，多愁善感。

我没有感觉到任何所谓的“社会分歧”。可是我又像过去那样忧郁了。

我试着调换职业和城市。我想逃避我这种可怕的忧郁。我预感到这忧郁将置我于死地。

我先迁居阿尔汉格尔斯克。继而又迁往北冰洋畔的麦津。后来又回到彼得格勒。未隔多久，又前往诺夫哥罗德，后又迁至普斯科夫。此后又搬到斯摩棱斯克省的红城。最后又回到彼得格勒……

不管我迁往哪里，忧郁始终寸步不离地跟踪着我。

三年之内，我换了十二个城市和十种行业。

我当过民警、会计、皮匠、家禽养育家、边防警卫部队电话员、刑事侦查员、法院的书记员、文书……

这不是坚定地生活道路上行进，这是一——张皇失措。

我参加了红军，重又在前线度过了半年时间，那是在纳尔瓦和亚姆布尔格附近。

可我的心脏被毒气损伤了，我必须考虑新的职业。

1921年，我开始写短篇小说。

自当作家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变。然而忧郁却一如既往。不仅如此，它光顾我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了。

于是我去找医生。除了忧郁之外，我的心脏有问题，胃有问题，肝也有问题。

医生们大刀阔斧地给我治疗。

对于后三种病，他们用药丸和水来给我治疗。主要是用水，内服外用双管齐下。

对于忧郁，他们决定采用四面夹击的方法将它逐走，同时从两翼，

从后方，从正面，向它发起攻势——就是说用旅行，海水浴，夏尔科^①淋浴疗法和在我那样的年龄所不可或缺的娱乐将忧郁逐走。

每年我要去疗养地——雅尔塔、基斯洛沃茨克、索契，或者其他人间福地——休养两次。

我在索契认识了一个人，他忧郁的程度比我要厉害得多。他每年至少要悬梁自尽两次，幸亏都叫别人救了下来。使他痛不欲生的是一种无端的忧郁。

我怀着极度的崇敬同这人交谈。我认为从他身上将可以看到恢弘博大的睿智、满腹经纶的才华和天才那种悲天悯人的微笑。在浮生若梦的尘世天才必定是永生的。

结果这一切连影子都没看到。

这是个愚钝的人，不学无术，没有丝毫教养可言。他一生充其量只读过两本书。除了金钱、酒食和女色之外，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在我面前的是个最平庸不过的人，满脑门子下流、愚蠢的欲念。

我甚至不是一下就看穿这一点的。起初我觉得屋子里好像烟雾腾腾，或者是气压计的水银柱下降了——预示要下大雷雨。我同他交谈时只觉得浑身不自在。后来我弄清楚了，这人是个蠢蛋。一个至多只能与之交谈三句话的木头槪子。

我的哲学体系出现了裂缝。我明白了，毛病不单单出在高级意识上。那么出在什么地方呢？我不知道。

我只得老老实实在地听命于医生。

两年内我吞下了足足有半吨重的药粉和药丸。

我乖乖地喝下各种各样讨厌的药剂，闹得我翻肠倒胃地想吐。

^① 让·马丁·夏尔科(1825—1893)：法国医学教师和临床医师，为现代神经病学创始人，研究过癔病及其他型神经官能症及其治疗方法。

我听任他们给我扎针，透视，泡在浴缸里。

然而治疗没有见效。相反，在这种治疗下，没过多久，我走在街上，熟人就认不出我来了。我瘦得脱了形，成了一副骷髅，只是外边包了一张皮。我没有一刻不畏寒。两手索索发抖。我的肤色黄得连医生们都吃惊了。他们怀疑我的忧郁型疑病已严重到药石无效的地步。别无他法，只有进医学研究所用催眠术治疗。

好几位医生中，只有一位医生成功地催我入眠了。催眠术见效后，他在我耳边暗示我说，我忧郁、愁闷是毫无道理的，世上的一切都那么美好，没有理由悲伤。

有两天时间我精神抖擞，可两天之后，我的情况反而比过去更糟，而且糟得多。

我几乎足不出户。每当新的一日到来，我就觉得这是个沉重的负担。

日子来了，又匆匆地离去，

我没有计算岁月已流逝几许，

我似乎失去记忆，忘掉了

尘世的沧海桑田和荣辱毁誉……

我两腿虚浮，在街上歪歪倒倒地走着，由于心脏病和肝区疼痛而气喘吁吁。

我不再去疗养地。确切地说，我去了那里，勉强挨过两三天后，就动身回家了，处于比去时更可怖的忧郁之中。

于是我乞灵于书籍。我是个青年作家，总共才二十七岁。理所当然，我应该求助于我的伟大的同行——作家们、音乐家们……我想知道他们有没有类似的情况。他们是否也像我一样忧郁。如果是的，照他们看来出于什么原因。他们为了排遣忧郁采取过什么措施。